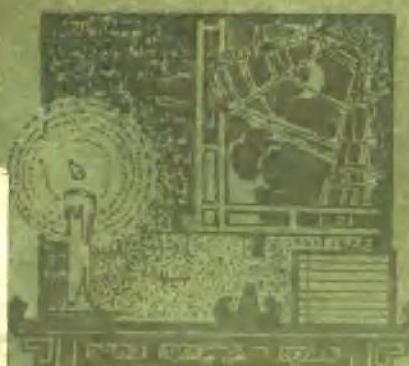


管林康振英权选译  
（清）蒲松龄著

聊斋志异选译

聊齋



## 聊斋志异选译

(清)蒲松龄 著  
康林管 振 盛英权 选译

---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 
(南昌市百花洲3号)
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
开本 787×1092<sup>1/32</sup> 印张 10<sup>1/8</sup> 字数 22万  
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江西第1次印刷  
印数：1—45,000

---

统一书号：10110·168 定价：0.77元

## 目 录

前 言.....	( 1 )
劳山道士.....	( 19 )
娇 娜.....	( 27 )
婴 宁.....	( 45 )
聂小倩.....	( 69 )
红 玉.....	( 90 )
连 城.....	( 107 )
商三官.....	( 119 )
罗刹海市.....	( 126 )
公孙九娘.....	( 151 )
促 织.....	( 167 )
姊妹易嫁.....	( 179 )
武 技.....	( 190 )
乱离二则.....	( 196 )
梦 狼.....	( 200 )
于去恶.....	( 209 )
凤 仙.....	( 225 )
牧 竖.....	( 245 )
张鸿渐.....	( 248 )
席方平.....	( 267 )
胭 脂.....	( 283 )
王 者.....	( 306 )
石清虚.....	( 313 )

## 前　　言

《聊斋志异》正式刊行于一七六六年，这已经是作者蒲松龄逝世五十多年以后的事了。但早在作者生前，《聊斋志异》就以手抄本的形式在社会上流传；刊行以后，“流播海内，几乎家有其书”，风行一时，脍炙人口，深受人们的欢迎和喜爱。它在清代初期的文坛上放出了绮丽夺目的光采，把文言短篇小说推向了新的高峰，在我国文学史上留下了珍贵的一页。

《聊斋志异》问世以前，我国文言短篇小说已经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笔记小说。这种小说，一类是记述神仙鬼怪，一类是记载名人轶事。但不管是记怪还是记人，作者并不是有意做小说的。所以那些作品虽也有些生动的故事，但大多是“粗陈梗概”，有的甚至是“丛残小语”，简单得很，同后来的小说不一样。这是小说的开始发展阶段。到了唐代，有的读书人有意写小说，就出现了传奇，使我国小说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。这种传奇小说，结构完整，形象鲜明，描

绘细致，想象丰富，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占了主要地位；即使谈神说鬼，往往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生活的真实。唐代传奇小说与魏晋笔记小说相比，已有了很大的发展，标志着我国小说已经趋向成熟。但是传奇小说触及时事，反映人民疾苦的作品不多，也极少劳动人民形象。这是因为传奇的作者大多是封建文人，他们写作的目的一般是为了显示才华，博取名利，正如鲁迅所说：“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抒牢愁，谈祸福以寓劝惩，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思想”。

蒲松龄创作《聊斋志异》，不仅汲取了志怪小说和传奇小说的长处，用传奇的笔法来描写花妖狐魅鬼神世界，而且寄托了自己的愤懑和理想，有着比较明确的社会目的。《聊斋自志》中说得很清楚：“子夜荧荧，灯昏欲蕊；肖斋瑟瑟，案冷疑冰。集腋为裘，妄续幽冥之录；浮白载笔，仅成孤愤之书：寄托如此，亦足悲矣！”他在寒冷如冰的荒斋之中，黑夜昏灯之下，一篇篇写成了这部巨著，是为了寄托他的满腔悲愤。正因为这样，《聊斋志异》中的优秀篇目，非但结构严谨，叙事委曲，形象生动，文笔活泼，而且主题明确，倾向鲜明，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。无论在艺术上，还是在思想上，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。既超过了魏晋志怪小说和唐代传奇小说，又不是后来的文言短篇小说所能企及的。它不仅在当时风行一时，直到现在，仍然是我国人民十分喜爱的古典小说之一。自从被译为英文和俄文之后，它和《天方夜谭》一类名著一样，受到外国读者的欢迎。

蒲松龄生于明崇祯十三年(一六四〇)，卒于清康熙五十四年(一七一五)。在这七十五年中，王朝交递，天下大乱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激烈。农民起义风起云涌，反清斗争此起彼伏。清代统治者为了维持其统治，进行了残酷的镇压。连年战乱，天灾连续不断，再加上官吏的横征暴敛，人民困苦不堪，无以聊生。广大农村出现了“大村烟火稀，小村绝鸡鸣”的悲惨情景。在地主阶级内部，斗争也十分尖锐。除了明代以来的大地主兼并中小地主的矛盾之外，又产生了满族与汉族地主之间的斗争。他们一方面共同把迅速上升的镇压农民起义的军事费用——即所谓“太平之税”，转嫁到广大农民身上，加重了对农民的压榨和剥削；另方面在其内部也展开了一场大鱼吃小鱼的剧烈争夺。占据优势的满族贵族集团和汉族官僚大地主，可以依仗官府，巧取豪夺，恣意横行，无所不为；地位低下的汉族中小地主，常常处于被吞并和压榨的地位，而蒲松龄就是这个阶层中的一员。

蒲松龄，字留仙，又字剑臣，号柳泉。出生在山东淄川(现在的山东淄博市)一个世代读书而已没落了的地主家庭里。早在他祖父蒲生纳的手中，家庭便已开始衰败。他父亲蒲槃二十几岁时，不得不抛开书本，经商谋生。然而并没有摆脱贫困，甚至穷到请不起教师，只能“躬自教子”的地步。

在当时社会和家庭的影响下，蒲松龄十分热衷功名。他自少很有才华，十九岁时接连考了县、府、道三个第一，名气很大。可是以后连续考试，都没有得中，贫困潦

倒，生活十分困难。结婚分家后，住在三间“旷无四壁”的农场屋子里，不得已向堂兄借了一块木板来分隔内外。三十岁时，应聘当了宝应县知县的幕宾。可是整天和无聊的应酬文字打交道，违背了他平生的志愿，第二年便辞职回家。从此他主要在家乡附近教书，过着“终岁不知肉味”，“十年贫病出无驴”的生活。他做了四十多年的穷秀才，边教书，边应考，七十岁时才“撤帐归来”。七十一岁时，按例成了贡生。四年后去世，终年七十六岁。

蒲松龄虽然满腹才华，却潦倒一世。亲身的经历，使他清醒地看到了官场仕途的腐朽黑暗。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：“仕途黑暗，公道不彰，非袖金输璧，不能自达于圣明，真令人愤气填胸，欲望望然哭向南山而去！”他虽然对最高统治者存有幻想，却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封建社会的本质，送金送玉才能得到当权者的赏识，除此之外根本就谈不上公道二字。尽管你满腹文章，也只能象卞和那样抱着璞玉去南山痛哭。正因为这样，蒲松龄对下层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痛苦，有了比较深切的了解。他看到农民为了按期交纳所谓“太平之税”，避免遭到官吏的荼毒，只好忍痛出售口粮。因此他“感于民情，则怆恻欲泣，利与害非所计也”。他要“为民请命”了。在清初文字狱横行，舆论毫无自由的情况下，他通过谈狐说鬼，写下了大量揭露黑暗，抨击时弊，抒发胸臆，歌颂美行的文字，是十分难能可贵的。

## 二

人生大半不得志，  
放言未必皆游戏。

这是蒲松龄的两句诗。在黑暗的封建社会里，广大人民受尽剥削压迫，能够“得志”的只能是极少数统治者。蒲松龄谈狐说鬼，并不是做笔墨游戏，而是为了揭露社会的黑暗，抒发胸中的愤懑，寄托自己的理想。《聊斋志异》中的许多优秀篇章，具有相当高的思想意义和进步倾向。

《聊斋志异》中有不少篇目，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，凶狠残暴，与广大人民的贫困破产，告诉无门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从而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矛盾。《促织》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篇。它相当典型地揭露了当时政治的腐败和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压迫。只因为皇帝一人爱斗蟋蟀，又因为地方官要讨好上司向上爬，下面的皂吏更借此为名敲榨勒索，以致每进贡一头蟋蟀，总有好多户人家被搞得倾家荡产。成名一家就是无数受害者当中的一个。成名原是个忠厚老实的穷秀才，被刁恶的公差逼着当了里正，遇到征收蟋蟀的年头，他不敢向老百姓摊捐派款，高价搜求，自己又无钱赔垫，因此限期一到，受尽官府拷打，无法可施，想要自杀。后来好不容易捉到了一头好蟋蟀，不幸又给九岁的儿子不小心弄死了。儿子害怕父亲回来责骂，吓得投井自杀。后来成名的儿子的灵魂变成一只轻捷善斗的蟋蟀，才挽救了一家被毁

灭的命运。而抚臣却因此博得皇帝的高兴，受赐名马衣缎，县太爷也得以“卓异”上闻。虽然最后说成名儿子复活，自己也得到了好处，削弱了小说的真实性，但我们仍能从中看到一幅由于皇帝昏庸，官吏贪婪，造成老百姓“贴妇卖儿”、倾家丧命的悲惨情景；同时也看到了封建官吏飞黄腾达的道路上，洒满了人民的鲜血。

《席方平》虽然写的是幽冥，抨击的却是封建官府贿赂公行，老百姓有冤难伸的黑暗社会。席方平为了替父伸冤，到阴府告状。可是由于城隍、郡司直至冥王都受了土豪羊某的贿赂，不但伸不了冤，而且接连遭到鞭笞、炮烙、锯劈等种种毒刑。作者让席方平愤怒地喊道：“受笞允当，谁教我无钱耶！”作品还通过二郎神的判词，痛斥了封建社会中大大小小官吏的令人发指的罪行。《梦狼》则通过梦境与现实的相互映照，把封建官吏比作吃人的虎狼，深刻地指出当时的社会是：“群狼阻道”，“白骨如山”，老百姓“进退无所主”。作品中虽有宣扬封建道德和因果报应的地方，但却十分有力地揭露了清代从上到下整个官僚机构的腐朽和黑暗。

土豪劣绅是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，他们勾结官府，横行乡里，无恶不作，是下层人民的直接的压迫者和剥削者。蒲松龄用他犀利的笔触，从不同角度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人民血泪斑斑的图景，记下了一笔笔豪绅罪恶滔天的暴行。《红玉》写忠厚耿直的冯翁一家，被一个因为贪赃被削了职的宋御史搞得家破人亡。父子被打死打伤，儿媳被抢，不屈而死。冯生几次上告，官府都不给伸雪。虬髯

客为他报了仇，县太爷反而拿他问罪，受尽毒刑，连怀抱中的幼儿也不能幸免，被抛掷在黑夜的荒郊。御史原是封建朝廷负责监察弹劾的官员，竟然因贪赃而罢官；一个被罢了职的官僚强抢民妇，打死人命，竟然受到地方官的包庇。这是多么辛辣的讽刺和深刻的揭露。在《商三官》中，读书人商士禹仅仅因为醉后开玩笑，得罪了当地一个土豪，便被活活打死。告到官府，一年多也得不到了结。社会的黑暗，正象商三官所说：“人被杀而不理，时事可知矣。”《石清虚》中，邢云飞因为有一块“四面玲珑，峰峦叠秀”、“孔孔生云”的假山石，就遭到势豪的公开抢夺和尚书大人的中伤陷害，直到被诬入狱，典质田产。这些篇章进一步说明了一个问题，土豪劣绅，地主恶霸所以能横行霸道，无恶不作，就是因为他们有官府的保护；封建社会的一整套官僚机构，是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人民的工具。蒲松龄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，虽然认识不到这一点，但在作品中却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现实的本质，是难能可贵的。

蒲松龄一生失意于科场，对封建科举制度的腐败，有深切的感受。他第一次以文言短篇小说的形式有力地抨击了封建科举制度。《于去恶》便是其中比较优秀的一篇。这一篇主题集中，深刻有力。作品通过于去恶生前科场失意，死后在考场的曲折遭遇，说明科举制度实际上是埋没人才的陷阱。作者愤怒指出，科举制度之所以“黜佳才而进凡庸”，是因为考官多是些“游神耗鬼”，不是瞎了双眼的“乐正师旷”，浅薄昏庸，便是爱钱如命的“司库和

娇”，贪财纳贿。作者还借于去恶之口，更进一步揭示了科举的恶果，使许多人把读书当作猎取功名的敲门砖，“门既开，则弃去”；他们得志以后，“目不睹坟典”，成了骑在人民头上的官老爷，那里还有什么学问可说。这就触到了科举仕途葬送人才的实质。

蒲松龄的憎与爱，对现实的不满与理想的追寻，在《罗刹海市》中表现得相当强烈而集中。他在读者面前展现了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：一个是诡异而令人憎恶的罗刹国，一个是美好而使人神往的海市东洋国。作者用夸张的笔墨，奇特的比喻，以罗刹国来影射封建社会，通过以美为丑，以人为妖的描绘，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是非颠倒，善恶不分，“花面逢迎，世情如鬼”的本质。看来是荒诞不经的海外奇谈，其实却道出了封建社会的真情实况。作者又以优美的笔调，满腔的热忱，描绘了一个美好的海市东洋国，用来寄托自己的理想。在那里人才受到重视，文章有人珍惜，君臣鱼水相得，夫妻和睦相亲，虽不免由于仙凡之隔，产生了悲欢离合之事，但也合乎“常情”。这就是作者所追求的理想之国。然而这个理想国，只不过是海市蜃楼罢了，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。现实的丑恶，理想的渺茫，通过这一反一正的对比和描绘，对封建社会作了比较彻底的否定。

但是，蒲松龄对科举制度的批判和对封建社会的否定，仍有他的局限和矛盾之处。从上面提到的作品中可以看出，他既抨击科场的腐败黑暗，又把应试看作读书人的唯一出路；既揭露科举制度埋没人才，又宣扬天数和命

运。就是他一心向往的理想之国，也仍然跳不出封建的社会制度和伦理道德的规范。这些消极的东西，需要加以鉴别和扬弃。

《聊斋志异》中最多的是爱情故事。作品通过鬼魂狐魅，花妖鱼精，热烈地歌颂了男女之间真挚、纯洁的爱情，冲击了封建礼教的樊笼，批判了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的婚姻制度。恩格斯说过：“人与人之间的，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，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。”可是封建礼教却把男女爱情，甚至正常的友谊，都看做大逆不道，看成是罪恶。《聊斋志异》中很多篇章，无视“男女授受不亲”等清规戒律，把男女之间的交往、性爱，当作正常的关系来描写，并作为美好的事物来赞扬，反映了人民要求婚姻自由的愿望，确是有着相当进步的意义的。婴宁与王子服，红玉与冯相如，连城与乔生，聂小倩与宁采臣等的爱情与友谊的描绘，自然、朴实、纯真，打破了封建礼教的一切枷锁，就是很好的例子。特别是婴宁和王子服的关系的描写，更是富有深意。一个是从未受封建礼教影响的天真无邪的少女，一个是虽受儒家诗礼薰陶但不受约束的青年。因此，他们对友谊、爱情的态度都十分真挚而爽直。这从两人在园中见面时的交谈便可看出。

生俟其笑歇，乃出袖中花示之。女接之曰：“枯矣，何留之？”曰：“此上元妹子所遗，故存之。”问：“存之何意？”曰：“以示相爱不忘也。……”女曰：“此大细事。至戚何所靳惜？待兄行时，园中花，当唤老奴来，折一巨捆负送之。”生曰：“妹子痴耶？”女曰：

“何便是痴？”曰：“我非爱花，爱捻花之人耳。”女  
曰：“葭莩之情，爱何侍言。”……

婴宁把遗花、送花、友谊、爱情，看得十分平常；王子服也非常坦率诚恳地倾诉了自己的爱慕之情，没有一点儿忸怩做作。笑本来是感情的自然流露，可是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，妇女不能随便说话，更不能笑。可是婴宁却毫无顾忌，笑声随之而来，伴之而去，充分显示了她乐观开朗的性格。笑成了她的主要的性格特征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笑在她身上散发出奇异夺目的光辉，使封建礼教黯然失色。显然，在婴宁这个形象上，作者只有倾注了自己饱满的思想感情，才能塑造得这样鲜明感人，并具有这样强的艺术力量。

《聊斋志异》中的爱情故事，不只停留在一见倾心、郎才女貌上，在许多地方刻划了他们之间患难与共、生死不渝的诚挚的友谊，写出了他们为了争取婚姻自由，打破门阀观念、父母包办的婚姻制度的强烈反抗精神。《娇娜》、《聂小倩》、《凤仙》、《城连》等篇，都是这方面的力作。娇娜见孔生死于身旁，大哭道：“孔郎为我而死，我何生矣！”痛切之情，溢于言表，十分感人。然而这种生死不渝的友谊，远远超出单纯的男女爱慕之情。他们的友谊诚挚而纯洁，是在贫困、疾病和生死关头互相支持帮助中建立起来的。聂小倩之所以爱上宁采臣，赤心相待，是因为宁采臣热情豪爽，品行端正，是一个可以帮助她脱离苦海的“刚肠”君子。而宁采臣也不是由于她长得“娇艳”，而是因为她善良、温顺、勤劳，所以明知她是

鬼，也不嫌弃，终于由怜悯而相爱。蒲松龄把这种相互了解，具有共同思想基础的爱情，称作知己之爱。这种具有社会意义的知己之爱，在《连城》中得到了形象而生动的表现。史孝廉征诗择婿，乔生通过诗篇，获得他女儿连城的爱慕。可是史孝廉却嫌他贫穷，不愿把女儿嫁给他。连城则不顾一切，派人“赠金以助灯火”，乔生深感连城了解自己。他们彼此相爱，要求结合，然而连续遭到家庭的阻挠，富商的欺凌，贪官的逼迫。但他们为了追寻幸福，生死相从，坚贞不渝，终于战胜了一切障碍，如愿以偿。作品通过曲折的故事，生动的情节，充分暴露了封建社会加在青年男女身上的沉重压力，反映了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由的要求与斗争精神。这种追求知己之爱的反抗精神的描绘，它的社会意义远远超过了“郎才女貌”“卿卿我我”的俗套。当然，《聊斋志异》中也有一些作品，流露了把妇女当作玩物的封建意识，这自然是应当剔除的糟粕。

《聊斋志异》反映的社会生活是相当广阔的，作者在描写社会生活图景时，寄托了自己的爱憎和理想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。《牧竖》歌颂了劳动人民的机智和勇敢；《劳山道士》鞭笞了不劳而获的丑恶思想；《武技》说明了稍有所得便沾沾自喜的人必然要招致失败；《乱离二则》反映了官兵如盗给人民带来的痛苦；《胭脂》既暴露了封建司法制度草菅人命，腐朽黑暗，又说明调查研究对正确判案的重要意义。在这个选译本中，还要提一提《公孙九娘》。清初，满族统治者对农民起义进行了血腥镇压。以于七为首的农民起义，就发生在蒲松

龄的家乡。作者以深沉悲愤的语调，委婉动人的情节，在《公孙九娘》一文中，揭示了封建统治者的残暴，对无辜被害的群众寄以深切的同情与悼念。作者虽未写出他对于七起义的态度，然而在文字狱遍于国中的黑暗世界里，能够真实地写出一次屠杀数百人，“碧血满地，白骨撑天，”“济城工肆，村木一空”的惨酷景象，不能说作者对农民起义毫无同情。在这方面，过于苛求作者，似也脱离了当时的历史条件。

### 三

衡量文学作品固然不能不看它的思想内容，社会意义，“但万不能忘记它是艺术”。一篇小说不具有一定的艺术性，也就不成为文学作品了。《聊斋志异》所以脍炙人口，流传至今，就是因为它不仅具有进步的思想内容，而且因为它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成就。

《聊斋志异》“用传奇法，而以志怪”，把现实生活的描绘和绮丽美妙的幻想融为一体，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。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说：

明末志怪群书，大抵简略，又多荒怪，诞而不情，《聊斋志异》独于详尽之外，示以平常，使花妖狐魅，多具人情，和易可亲，忘为异类，而又偶见鹘突，知复非人。

明末的志怪小说，不但十分简略，只记个故事梗概，而且荒诞不经，不近人情，往往给人留下怪异和恐怖的印象。

《聊斋志异》则有了创造性的发展，作者不只描写详尽生动，叙事委婉曲折，更重要的是，把超现实的花妖狐魅幽冥世界交织到现实社会中来，使花妖狐魅和幽冥世界人格化和社会化；同时，又充分利用描写超现实世界可以自由驰骋的方便，使得花妖狐魅神通广大，变化多端，让他们做出现实世界不可能做到的事情。使好人得到解救，得到幸福；坏人得到惩罚，得到恶果。小说中的花妖狐魅鬼神世界，其实正是现实社会的曲折反映，是作者爱憎、愿望、理想的寄托。大部分作品想象丰富奇特，画面绚丽多彩，情节委婉曲折，人物性格鲜明，寓意深沉隽永，格调明朗开阔，具有浓郁的积极浪漫主义色彩。而这种积极浪漫主义又是深深扎根于现实之中，具有长久不衰的艺术魅力。

文学是人学。塑造人物形象是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任务。《聊斋志异》在这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，创造了众多令人难忘的形象。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青年妇女形象。就多数来说，她们的共同特征是：美丽温顺而又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，勤劳善良而又富于反抗精神，她们勇敢机智乐于助人，她们乐观开朗又具有超人的本领，常常做出人们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。她们大多体现了下层社会妇女的某些本质特征。但是，这些共同的特征，又是通过活生生的具体的个别的性格体现出来的。连城坚定、执着，思虑周密，处事果断；婴宁天真、坦率，娇憨之态可掬；聂小倩善良、深沉、机智，善于体贴人意；凤仙高傲、倔强、泼辣，不拘细节而从大处着眼；红玉纯朴、温厚、勤

劳，颇能体谅别人的难处，又乐于助人于急处；娇娜“娇波流慧”，妙语怡人，感情真挚而纯洁……作者通过言谈举止、思想行动的描绘，把她们各自独特的个性刻划得活灵活现，在读者面前展现了一幅摇曳多姿，神彩各异的青年妇女群象。

与此同时，作者还塑造了许多青年男子的形象，如，不怕锯劈炮烙，不贪荣华富贵，百折不挠地和黑暗势力坚持斗争的席方平；性情豪爽，“廉隅自重”，抗拒美色黄金引诱的宁采臣；爱情纯净专一，舍身忘死地争取婚姻自由的乔生，等等，都刻划得十分鲜明动人。其它如《劳山道士》中的王七，《武技》中的李超等，也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形象。

《聊斋志异》刻划人物，很少单纯的心理描写，不作冗长的介绍，主要是通过人物行动来展示他的性格。连城明知父亲嫌乔生贫穷，仍然“逢人辄称道”，“赠金以助灯火”，表现了她爱情的坚定执着。当两人即将重返人世时：

女惕惕若不能步，生伫待之。女曰：“妾至此，四肢摇摇，似无所主。志恐不遂，尚宜审谋；不然，生后何能自由？”相将入侧厢中。默定少时，连城笑曰：“君憎妾耶？”生惊问其故。赧然曰：“恐事不谐，重负君矣。请先以鬼报也。”生喜，极尽欢恋。因徘徊不敢遽生，寄厢中者三日。连城曰：“谚有之：‘丑妇终须见姑嫜。’戚戚于此，终非久计。”乃促生入。

如果把他们生前死后的遭遇联系起来看，连城决心“先以